

論黨工作之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

兩面份子及其他兩面份子之辦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1842B

175042

斯大林著

論黨工作之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
兩面份子及其他兩面份子之辦法

一九三九年印



一九三九年一月初版

著 者	斯 大 林
作 者	
出 版 者	拓 社
經 售 者	潮 鋒 出 版 社 光 明 書 報 社 五 洲 書 報 社
浙 江 經 售 處	麗 水 大 時 代 書 店 金 華 新 知 書 店 紹 興 大 時 代 書 店

目次

報告	一
一、政治上的漠不關心態度	三
二、資本主義的包圍	一〇
三、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	一五
四、經濟勝利之陰影的方面	二四
五、我們的任務	三〇
結論	四九

報告

同志們！

從全會上的報告和對於報告的討論中，可以明白看出，我們在這裏所講的，是以下三件基本事實。

第一，外國奸細——在這些奸細中間，托洛茨基份子起了很積極的作用——之暗害，軍事破壞及偵探勾當，侵入我們所有的，或者是幾乎所有的組織，無論經濟的組織，或行政的和黨的組織中來，不過程度不同而已。

第二，外國奸細——托洛茨基分子在內——不僅混進了我們的下級組織，而且也鑽得了某些負責的職位。

第三，我們的某些擔任領導工作的同志——無論在中心或在地方——不僅沒有能夠識破這些暗害者，軍事破壞工作者，偵探和殺人兇手的真面目，而且竟然表現了這樣漠不關心，馬虎虎，幼稚的態度，以至於往往自己幫助了外國奸細鑽得某種負責的職位。

這三件無庸爭辯的事實，就是從全會上的報告以及對於報告的討論中所自然而然歸結出來的結論。

一 政治上的漠不關心態度

爲什麼我們的一些做領導工作的同志，雖然有很豐富的，進行反對各種反黨以及反蘇維埃派別的鬭爭之經驗，而在這一次卻竟然表現了如此幼稚而昏聩的態度，以至於沒有能夠識破人民公敵之真面目，沒有能夠看出蒙着羊皮的豺狼，沒有能夠揭破他們的假面具呢？

是否可以說，外國奸細在蘇聯境內所幹的暗害，軍事破壞及偵探勾當，乃是什麼出乎我們意料以外和破天荒的事情呢？決不可以這樣說。關於這一點，最近十年來——從沙哈亭案件時期起——在我國國民經濟各部門中之暗害事件，已經在我們的正式文件中註明得很清楚了。

是否可以說，在最近這個時期以來，關於法西期主義之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奸細份子所幹的暗害、偵探、或恐怖暗殺的勾當，在我們這裏，未曾有過警號和預告呢？決不可以這樣說。這樣的警號是有過的；布爾塞維克是沒有權利忘記這些警號的。

基羅夫同志之被萬惡兇手暗殺，便是第一個嚴重警號，說明人民公敵將玩弄兩面手腕，而為要玩弄兩面手腕，他們將戴上假面具，以布爾塞維克名義做護身符，以黨員名義做護身符，以便博得信任和乘機鑽進我們的組織。

『列寧格拉總部』審判案以及『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審判案，又證實了那些從基羅夫同志之被萬惡兇手暗殺的事實中所應得出的教訓。

『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聯合』審判案，更擴大了前兩次審判案中的教訓，明白表明了季諾維也夫份子和托洛茨基份子是把所有一切敵視的資產階級份子聯合在自己週圍，明白證明了他們已經變成為德國警察暗探局進行偵探、軍事破壞、恐怖暗殺勾當的好細；明白證

明了兩面手腕和戴假面具，乃是季諾維也夫份子和托洛茨基份子藉以鑽進我們的組織中來的唯一手段；明白證明了警惕精神和政治精明眼光，乃是預防這種鑽營企圖和消滅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匪幫之最可靠的手段。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因基羅夫同志被萬惡兇手暗殺事而發出的告同志的祕密信中，曾堅決地警告各級黨組織，要牠們拋棄政治上的馬虎態度和庸俗的疏忽精神。在這封祕密信中說道：

「必須剷除那種以錯誤設想爲出發點的機會主義的馬虎態度，這種錯誤設想卽是以爲隨着我們力量之增長，敵人就日益馴服和日益軟化。這種設想是根本錯誤的。這種設想乃是右傾思想之復發，這種右傾思想要大家相信，敵人將於無形中同化於社會主義制度，敵人終究會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可是，我們布爾塞維克，決不應當抱這種高枕而臥和疏忽的態度。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馬虎態度，而是警惕精神，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革命

警惕精神。要記着，敵人之情況，越是沒有希望，他們便越愛把極端手段作爲與蘇維埃政權作最後掙扎鬪爭之唯一手段。必須記着這一點，而時刻警惕着。」

聯共（布）中央，於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因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之偵探及暗殺活動事而發出的告同志的祕密信中，又再一次號召各級的黨組織提起最高限度的警惕精神，要善於識破人民公敵之真面目，不管這些人民公敵裝飾得如何巧妙。在這封祕密信中說道：

「現在已經完全證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野獸們，在其反蘇維埃政權的鬪爭中，把我國勞動羣衆之所有一切最兇殘和最可惡的敵人——偵探、奸細、軍事破壞工作者、白黨份子、富農等等——都聯合起來；現在，這些份子與托洛茨基份子及季諾維也夫份子已沒有任何區別；在現今這個時候，所有我們一切黨組織，所有全體黨員，都應當了解共產黨員之警惕精神，在任何一個工作部門內和任何一個環境裏，都是必不可少的。在目前

條件之下，每一個布爾塞維克之應有的品質，就是要善於識破我黨敵人之真面目，不管這些敵人裝飾得如何巧妙。」

由此可見，警號和預告是有過的。

這些警號和預告所號召的是什麼？

牠們所號召的，就是要消滅黨的組織工作中的弱點，把黨變成爲使任何一個兩面份子都不能鑽進的堡壘。

牠們所號召的，就是要剷除那種輕視黨的政治工作的態度，並實行一個澈底的轉變，來極力加強這個工作，來加強政治的警惕精神。

結果怎樣呢？事實證明，我們的同志，對於這些警號和預告，是領會得過於遲鈍。

對於這一點的明顯證明，便是在進行審查黨文件和更換黨證的運動中所暴露出來的盡人皆知的事實。

爲什麼這些預告和警號沒有發生應有的效力呢？

爲什麼我們的黨員同志，雖然他們有對反蘇維埃份子進行鬪爭的經驗，雖然知道許多警號和預告，可是竟然表現了政治的近視態度，未能發覺人民公敵之暗害、偵探以及軍事破壞的勾當呢？

也許是因爲我們的黨員同志比以前壞了，不像以前那樣有覺悟和守紀律了？不是的，當然不是的！

也許是他們已經開始蛻化了？也不是！這樣的設想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那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這種糊塗、漠不關心、馬馬虎虎、昏聩的態度，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

這是因爲，我們的黨員同志，既然醉心於經濟工作和經濟建設方面的巨大成績，於是就簡直忘記了布爾塞維克沒有權利忘記的一些很重要的事實。他們忘記了蘇聯所處的國際情況

中的一個基本事實，他們沒有看出兩個很重要的事實，而這兩個事實，是與現在的以黨證爲護符和以布爾塞維克名義爲掩飾的那些暗害者偵探、軍事破壞工作者以及殺人兇手有直接的關係。

二 資本主義的包圍

這些爲我們的黨員同志所忘記了或簡直沒有看出來的事實，究竟是什麼呢？

他們忘記了，蘇維埃政權，還只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獲得勝利，而其餘六分之五還是資產階級國家的領土。他們忘記了，蘇聯是處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在我們這裏，有些人雖然也愛說什麼資本主義的包圍，可是卻不願意想一下，這個資本主義的包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要知道，資本主義的包圍，這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一個很實在而很不愜滿意的現象。資本主義的包圍，這就是說，在世界上，有一個國家——蘇聯，在自己境內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同時，除牠

而外，卻還有許多國家——資產階級國家，還繼續過着資本主義的生活，並包圍着蘇聯，時刻等待時機，以便實行侵犯牠，打碎牠，或者至少是要損害牠的勢力而削弱牠。

我們的同志竟忘記了這個基本事實。殊不知，恰是這個事實，決定着資本主義包圍與蘇聯相互關係之基礎。

例如，就拿資產階級的國家來說罷。思想幼稚的人，也許會認為在這些資產階級國家彼此之間，存在着特別友好的關係，因為牠們都是同類的國家。可是，只有思想幼稚的人才能這樣設想。其實，牠們彼此間的關係，是離友好關係非常之遠的。事實已好似二二等於四一樣證明了，資產階級的國家，彼此效尤，各自派遣自己的偵探、暗害者、軍事破壞工作者，有時甚至派遣殺人兇手到別國後方，叫他們混進別國的機關及企業中去，在那裏佈置自己的奸細網，並『在必要時』破壞其後方，以減弱並損害其勢力。現在是這樣。而且過去也是這樣。例如，就以拿破崙第一時代的歐洲各國為例罷。當時在法國是佈滿了俄國、德意志聯邦、奧國、英國的偵探和軍事破壞

工作者。反之，在英國、德意志聯邦、奧國和俄國後方，也同樣佈滿了由法國所派出的偵探和軍事破壞工作者。英國奸細，曾兩次佈置謀刺拿破崙的事件，並屢次發動法國凡臺省的農民反對拿破崙政府。而拿破崙政府究竟是怎樣一個政府呢？拿破崙政府乃是資產階級的政府，牠撲滅了法國革命，而牠所保存的，祇是法國革命中那些有利於大資產階級的果實。不消說，拿破崙政府，也並不讓於自己的鄰邦，同樣也是採取了自己軍事破壞的辦法。過去的情形，一百三十年以前的情形，曾經如此。現在的情形，距拿破崙第一百三十年以後的情形，也是如此。現在，在法國和英國，佈滿了德國的偵探和軍事破壞工作者；反之，在德國，也有英法的偵探和軍事破壞工作者從事活動。在美國，佈滿了日本的偵探和軍事破壞工作者；同樣，在日本，也是佈滿美國的偵探和軍事破壞工作者。

這就是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關係之規律。

試問，資產階級國家對待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爲什麼應當比牠們對待自己同類的資產

階級國家的態度，柔和而友善些呢？牠們派到蘇聯後方來的偵探、暗害者、軍事破壞工作者以及殺人兇手，爲什麼應當比牠們派到自己同類的資產階級國家中去的偵探、暗害者、軍事破壞工作者以及殺人兇手，少些呢？這是從那裏得來的結論呢？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作相反的推測，恐怕要比較更正確罷，就是說，豈不是應當認爲，資產階級國家所派到蘇聯來的暗害者、偵探、軍事破壞工作者以及殺人兇手，要比牠們派到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後方去的，還多兩倍三倍嗎？

只要資本主義的包圍依然存在，則在我國後方，便將繼續有被外國偵探機關派來的暗害者、偵探、軍事破壞工作者及殺人兇手從事活動，這豈不是顯而易見嗎？

關於所有這些，我們的黨員同志，竟然忘記了；而因爲他們忘記了這一點，所以就感覺到事出意外。

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日德警察暗探局之托洛茨基奸細所幹的偵探和軍事破壞勾當，就成

了完全出乎我們某些同志意料以外的事情。

三 現時托洛茨基的主義

其次，我們的黨員同志，在進行反對托洛茨基奸細的鬥爭時，竟未注意到，竟未看出，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已不像以前那樣，譬如說，已不像七八年以前那樣；在這個時期中，托洛茨基主義和托洛茨基份子已發生了很重大的變化，以致使托洛茨基主義之面貌，根本改變了，因此，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之方法，也應當根本改變。我們的黨員同志，沒有注意到托洛茨基主義已不復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托洛茨基主義已經由工人階級中的政派——在七八年以前牠曾是這樣的政派——變成了遵照外國偵探機關之指令而活動的暗

受害者、軍事破壞工作者、偵探及殺人兇手的赤裸裸的無原則的匪幫。

什麼叫做工人階級中的政派呢？工人階級中的政派，就是這樣一個集團或政黨；這個集團或政黨，有其一定的政治面目、政綱和綱領；這個集團或政黨，並不能不在工人階級面前隱瞞自己的觀點，恰巧相反，牠正是在工人階級面前公開而坦白宣傳自己的觀點；這個集團或政黨，並不怕向工人階級表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不怕向工人階級宣佈自己的政治目的和任務，而恰巧相反，牠正是公開到工人階級中間去，說服他們相信牠的觀點之正確。過去，在七八年以前，托洛茨基主義曾是工人階級中的這樣的政派之一，固然，是一個反列寧主義的，因此也就是極端錯誤的政派，可是，牠當時總算是一個政派。

是否可以說，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比方說，一九三六年的托洛茨基主義，也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政派呢？決不可以這樣說。爲什麼呢，因爲現時的托洛茨基份子，是生怕向工人階級表明自己的真正面目，生怕向工人階級宣佈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務，卻多方在工人階級面前，隱瞞

自己的政治面目，因為他們恐怕如果工人階級一旦識破他們的真正企圖，那工人階級就會立刻咒罵而摒棄他們這些異己份子，就會立刻把他們逐出自己的隊伍。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托洛茨基份子現在所採取的基本工作方法，並不是在工人階級中間公開而坦白宣傳自己的觀點，而是極力掩藏自己的觀點，用阿諛獻媚的態度和拍馬屁的手腕，頌揚對方的觀點，用假仁假義和虛偽欺騙的手腕，糟蹋自己本身的觀點。

你們當然記得，在一九三六年的法庭審判中，加米業夫和季諾維也夫曾堅決否認他們自己有什麼政綱。當時，他們在法庭審判中，曾有完全的可能來說出自己的政綱；可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卻聲言他們並沒有任何的政綱。毫無疑義的，他們兩人之否認他們有政綱，這完全是故意騙人。現在誰也看得清楚，他們是有自己的政綱。可是，為什麼他們否認了自己有任何的政綱呢？這是因為他們生怕公開表明自己真正的政治面目；他們生怕宣佈自己真正的、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政綱，因為他們恐怕他們這種政綱，會引起工人階級之唾棄。

在一九三七年的法庭審判中，皮達可夫、拉迪克和索考里尼可夫，是走了另一條道路。他們沒有否認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是有自己的政綱。他們承認他們是有一定的政綱；他們在自己的供詞中，供認了並說出了這個政綱。可是他們之說出這個政綱，並不是爲着號召工人階級，號召人民去擁護這個托洛茨基政綱，而是爲的痛斥和咒罵這個反人民、反無產階級的政綱。恢復資本主義、取消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恢復剝削制度、與德日法西斯勢力勾結以加速反蘇聯戰爭之爆發、擁護戰爭而反對和平政策、分裂蘇聯領土而將烏克蘭割讓給德國和將沿海州割讓給日本、準備使蘇聯在被敵國侵犯時遭受軍事失敗；而爲要實行這些任務的方法，便是進行暗害、實行軍事破壞、用個人恐怖手段暗殺蘇維埃政權之領導者、替日德法西斯勢力進行偵探工作，——凡此種種就是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之政綱，即皮達可夫、拉迪克與索考里尼可夫所說出的政綱。顯而易見的，托洛茨基份子，當然不能不在人民面前，不能不在工人階級面前，隱瞞這個政綱。而且，他們不僅在工人階級面前隱瞞了這個政綱，並且在托洛茨基下層

份子面前也隱瞞了這個政綱；而且他們不僅在托洛茨基下層份子面前隱瞞了這個政綱，並且甚至於在總共不過僅僅三四十個人的托洛茨基上層領導份子面前，也隱瞞了這個政綱。當拉迪克和皮達可夫要求托洛茨基允許他們召集僅僅三四十個人的托洛茨基份子會議，以便通知關於這個政綱之性質的時候，托洛茨基便禁止他們召集這樣的會議；說，甚至於把這個政綱之實質告訴只是很小一部份托洛茨基份子，都是不應當的，因為這種『手續』會引起分裂。

這些所謂『政治人物』，不僅在工人階級面前，並且在托洛茨基下層份子面前；而且不僅在托洛茨基下層份子面前，並且在托洛茨基上層領導份子面前，隱瞞自己的觀點——這就是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之面貌。

由此可見，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已不能叫做工人階級中的政派。

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而是一夥無原則的、無思想的、暗害者、軍事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工人階級之死敵的匪幫，是外國偵探機關僱傭的好細。

這就是托洛茨基主義最近七八年以來所起變化之無可置辯的結果。

這就是已往的托洛茨基主義和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區別。

我們的黨員同志之錯誤，就在於他們未看出已往的托洛茨基主義和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之間這個深刻的區別。我們的黨員同志沒有看出，托洛茨基份子早已不是有思想的人，托洛茨基份子早已變成白晝行劫的強盜，這些強盜，爲了危害蘇維埃國家和蘇維埃政權，遂不惜採用任何卑污下賤的手段，一直到充當外國的偵探，直接叛賣自己的祖國。我們的黨員同志因爲沒有看出這一點，於是就未能及時改造自己的工作，以使用新方式，更堅決進行反對托洛茨基份子的鬥爭。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托洛茨基份子近年來所進行的卑污齷齪的勾當，便成了完全出乎我們某些黨員同志意料以外的事情。

其次，末了，我們的黨員同志沒有看出，在現時的暗害者和軍事破壞工作者——在這中間，

法西斯主義之托洛茨基奸細份子是起了很積極的作用——與沙哈亭案件時期的暗害者和軍事破壞工作者之間，是有很大的差別。

第一，沙哈亭暗害份子和工業黨人，乃是公開敵視我們的份子。其中大部份，都是過去的企業主，過去替舊主人服務的經理，過去的股份公司的股東，或者簡直就是公開在政治上仇視我們的舊資產階級專家。當時，在我們自己的人中間，誰都明白知道這些老爺們之真正的政治面目。而且，沙哈亭暗害份子自己也並未隱瞞其仇視蘇維埃制度的態度。可是關於現時的暗害份子和軍事破壞工作者，關於托洛茨基份子，就不能這樣說了。現時的暗害份子和軍事破壞工作者，托洛茨基份子，大部份都是黨員，都帶有黨證，因此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他們並不是異己份子。以前的暗害份子，是公開反對我們的人的份子；而現時的暗害份子，卻恰恰相反，卻在我們的人面前慙懣獻媚，頌揚我們的人，拍他們的馬屁，以便博得信任。你們看，這裏的差別是很大的。

第二，哈沙亭暗害份子和工業黨人之力量，就在於他們多少握有必要的技術知識，而同時

我們的，人因為沒有這種智識，曾不能不向他們學習。這種情況，便給了沙哈亭案件時期的暗害份子以大的長處，給了他們一種自由無阻地進行暗害工作的可能，給了他們一種在技術上欺騙我們的人的可能。而現時的暗害份子，托洛茨基份子，就不是如此了。現時的暗害份子，在技術知識方面，並沒有絲毫優勝於我們的人的長處。反之，我們的人在技術修養方面，比現時的暗害份子，比托洛茨基份子要優勝得多。自從沙哈亭案件發生以後到現在，在我國已培養出成千成萬的、真正的、富有技術修養的布爾塞維克幹部。我們可以舉出幾千幾萬個富有技術修養的布爾塞維克領導者；從技術修養方面比較起來，所有那班皮達可夫與利夫什茨、舍斯托夫與巴古司拉夫斯基、摩拉洛夫與多羅布尼斯之流，都不過是一些專說廢話者和門外漢而已。既是這樣，那末，現時的暗害份子，托洛茨基份子之力量，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他們的力量，就在於他們混得了黨證，攜帶着黨證。他們的力量就在於，黨證給了他們政治的信用，給了他們混進所有我們的機關和組織中來的機會。他們所有的長處，就在於他們既然有黨證，並假裝着蘇維埃政權底朋

友，於是他們就往往在政治上欺騙我們的人，利用他們所獲得的信任，暗地裏進行暗害勾當，把我們的國家祕密洩露給蘇聯底敵人。這種『長處』就其政治和道德的價值說來，當然是很成問題的，可是終究是一個『長處』。歸根到底說來，正因為有這種『長處』，所以托洛茨基暗害份子，這些帶有黨證，因而有機會鑽進我們的機關和我們的組織中所有一切地方的人，便成了外國偵探機關底無價之寶。

我們某些黨員同志之錯誤，就在於他們沒有看出，沒有懂得在舊時的暗害份子和新的暗害份子之間，在沙哈亭暗害份子和托洛茨基份子之間的所有這些差別，而因為沒有看出這一點，所以他們就未能改造自己的工作以使用新的方式進行鬥爭以反對新的暗害份子。

四 經濟勝利之陰影的方面

這就是我們國外國內狀況方面的主要事實，而我們許多黨員同志却忘記了，或沒有看出這些事實。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最近幾年來所發生的暗害與軍事破壞事件，便成了完全出乎我們的人意料以外的事情。

也許有人會問：可是爲什麼我們的人竟沒有看出所有這些事實，爲什麼我們的人竟忘記了所有這些事實呢？

所有這些健忘、昏聩、漠不關心、馬馬虎虎的態度，是從何而來的呢？

這是不是我們的人在工作中的固有毛病呢？

不是的，這不是固有的毛病。這是一時的現象。這種現象，只要我們的人有稍許的努力，就能迅速消滅下去。

那末，究竟是什麼會這樣呢？

這就是因為我們的黨員同志在最近幾年來完全埋頭於經濟工作，極端醉心於經濟的成績，而因為醉心於這一切事情之故，就忘記了其他一切事情，放棄了其餘一切事情。

這就是因為他們因醉心於經濟工作成績，於是就以爲經濟工作可以包括一切，而對於像蘇聯之國際環境、資本主義的包圍、加強黨的政治工作、防止暗害工作等等這類的事情，就毫不加以注意，而認爲這些問題，是次等，或者甚至是第三等事情。

勝利與成績，當然是一件大事情。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勝利，的確是巨大的。可是勝

利，也如世上一切東西一樣，却有其陰影的方面。政治經驗不夠的人，一遇到大的勝利，大的成績，就往往發生漠不關心、馬馬虎虎、自滿自足、過分自信、目空一切、妄自誇大的心理。你們不能否認，最近幾年來，在我們當中已產生了很多自誇自負的人。無怪乎在社會主義建設獲得重大勝利的這種環境中，就養成自負自誇的情緒，慶祝勝利的狂熱，輕視敵人力量而誇大自己威風的心理，而因為如此種種，結果就發生政治上的昏聩。

在這裏，我便要關於那些因有勝利而發生的危險，那些因有成績而發生的危險。說幾句話。關於那些因有困難而發生的危險，我們已憑經驗而知道。我們與這種危險已進行多年的鬭爭，而且應當說，我們這種鬭爭不是沒有成效的。因困難而發生的危險，往往使意志不堅定的人，發生灰心喪氣的情緒，不相信本身力量的情緒，悲觀主義的情緒。反之，在為消滅因困難而發生的危險而作的鬭爭中，人們便得到鍛鍊，結果成為真正的鐵的布爾塞維克。這就是因困難而發生的危險之本質。這就是為克服困難而獲得的結果。

可是，還有另外一種危險，即因有勝利而發生的危險，因有成績而發生的危險。同志們，是的，正是因有勝利，因有成績而發生的危險哩。這種危險，就在於政治經驗不夠的人，閱歷不很多的人，一遇到勝利環境，——一看見節節勝利，步步成功，一再超過完成計劃，——便發生漠不關心的態度、自滿自足、鋪張和慶祝勝利、彼此頌揚不休，以至於不能辨別大小輕重、削弱政治知覺、懈怠疏忽、高枕而臥。

無怪乎在這種妄自尊大、自滿自足的昏沉空氣中，在這種誇功自滿、趾高氣揚的空氣中，人們就忘記某些對於我國命運有頭等意義的事實，人們竟開始看不出這樣一些不愜意的事實，如資本主義的包圍、暗害勾當之新方式以及因我們有勝利而發生的危險等等。資本主義的包圍嗎？這算得什麼！既然我們完成和超過完成我們的經濟計劃，試問資本主義包圍，還能有什麼意義呢？暗害勾當之新方式嗎？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鬭爭嗎？所有這些都不過是無關重要的小事？既然我們完成並超過完成我們的經濟計劃，試問所有這些小事情，還能有什麼意義呢？黨章

嗎？黨的機關應用選舉手續產生嗎？黨領導者應向黨員羣衆報告工作嗎？試問這種事情究竟有何必要？既然我們的經濟是向前發展，而工農之物質生活就日益改善，試問是否根本還值得過問這些小事情呢？所有這些都是無關重要的小事情。既然我們超過完成我們的計劃，我們的黨既然不壞，黨的中央亦復不差，——試問我們還需要什麼呢？一些怪人，在莫斯科那裏，在黨的中央那裏坐着；憑空想出一些什麼問題，談論什麼暗害勾當，自己不睡覺，也不讓別人睡覺……

這就是一個顯明例子，說明我們的一些經驗不夠的同志，是如何容易而「簡單地」因為醉心於經濟成績之故，而染受政治上昏曠的毛病。

因有勝利，因有成績而發生的危險，就是如此。

我們的黨員同志之所以因醉心於經濟勝利而忘記對於蘇聯有重要意義的國際和國內事實，而沒有看出許多圍繞我國的危險，其原因就是如此。

我們的人之所以發生漠不關心態度、健忘、馬馬虎虎、政治上昏曠的毛病，其根源就是如此。

我們的經濟工作和黨工作之所以有缺點，其根源就是如此。

五 我們的任務

怎樣來消滅我們工作中的這些缺點呢？

爲要消滅這些缺點，就需要做些什麼呢？

必須實行以下的辦法。

(1) 首先就必須使我們的黨員同志，爲這個機關或那個機關「日常問題」所糾纏的同志，轉而注意大的、國際和國內的政治問題。

(2) 必須把我們黨的政治工作提到應有的高度，而把給黨的幹部、蘇維埃幹部、經濟工

作幹部以政治教育和布爾塞維主義鍛鍊的任務，當作首要任務。

(3) 必須向我們的黨員同志解釋：經濟的成績，雖然無可置辯地是有偉大的意義，雖然我們在今後也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為獲得此種成績而努力——可是經濟的成績終究不能概括我們的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必須解釋：那些因有經濟勝利而發生的危險，自滿自足的心理，漠不關心的態度、政治知覺陷於遲鈍的毛病，只有當經濟成績是與我黨建設及我黨開展政治工作之成績配合起來時，才能消滅下去。

必須解釋：經濟成績及其穩固性和持久性，本身就完完全全依靠於黨的組織工作和黨的政治工作之成績，如沒有這個條件，則經濟成績，就會立足不穩。

(4) 必須記着和片刻不忘：資本主義的包圍，乃是決定蘇聯國際情況之主要事實。必須記着和片刻不忘：只要資本主義的包圍還依然存在，則外國偵探機關，將繼續派遣暗

受害者、軍事破壞工作者、偵探、暗殺者到我們蘇聯後方來；必須記着這一點，並反對那些輕視資本主義的包圍這一事實之意義，那些轉視暗害行為之力量 and 意義的同志。

必須向我們黨員同志解釋：任何經濟成績，不管其如何偉大，都不能取消資本主義的包圍這一事實以及由這一事實所發生的結果。

必須採取必要的辦法，以便使我們的同志、黨員的布爾塞維克以及非黨員的布爾塞維克，有可能去認識外國偵探機關所進行的暗害勾當、軍事破壞工作、偵探活動之目的和任務，實行和方法。

(5) 必須向我們的黨員同志解釋：托洛茨基份子，乃是替外國偵探機關進行軍事破壞工作、暗害勾當、偵探活動的積極份子，他們早已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他們早已不是服務於任何與工人階級利益相容的思想的人；他們早已變成一夥毫無原則的、毫無思想的、被外國偵探機關僱傭的暗害份子、軍事破壞工作者、偵探、殺人兇手的匪幫。

必須解釋：在反對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鬭爭中，現在所需要的，已經不是舊方法，不是辯論方法，而是新方法，連根剷除和粉碎的方法。

(6) 必須向我們的黨員同志解釋現時的暗害份子與沙哈亭案件時期的暗害份子之間的差別；必須解釋沙哈亭案件時期的暗害份子是憑藉着技術知識，利用我們的人之技術知識落後而欺騙了我們的人；而現時的暗害份子，握有黨證的暗害份子，卻憑藉着我們對於他們如同對於黨員的政治信任，利用我們的人之政治上的漠不關心態度，而欺騙我們的人。

必須對那個適合於沙哈亭案件時期的舊口號，即關於精通技術的口號，補充以完全適合於現時期的新口號，即關於給幹部以政治教育，關於精通布爾塞維主義和剷除在政治上輕易信任態度的口號。

也許有人會問：難道在十年以前，在沙哈亭案件時期，不可一同提出這兩個口號，既提出第一個關於精通技術的口號，又提出第二個關於給幹部以政治教育的口號嗎？是不可以的。我們

布爾塞維克黨是不這樣做的。在革命運動每個轉折關頭，總是有一個基本的口號提出來，作爲基本的環節，以便一抓住這個環節，就可拖出整個鑷條。列寧正是這樣教訓我們：必須找到我們工作整個鑷條中的基本環節，緊緊抓着這個環節，拖出這個環節，以便藉着這個環節來拖出整個鑷條而向前進展。革命運動之歷史已經指明這個策略是唯一正確的策略。在沙哈亭案件時期，我們的人之弱點，就在於他們的技術知識落後。當時，我們的弱點，並不是與政治問題有關，而是與技術問題有關。至於說到我們對於當時暗害份子的政治態度，那末，很明顯的，是布爾塞維克對待政治敵人的態度。我們因爲提出了關於精通技術的口號，結果我們便消滅了自己的這種技術弱點，而在過去這個時期內，培養出幾萬個幾十萬個富有技術修養的布爾塞維克幹部。現在的情形，卻不同了。現在我們已有富有技術修養的布爾塞維克幹部，現在在做暗害份子的人，已經不是公開敵視我們的，並且不是在技術方面有什麼優勝於我們的人的份子；而是握有黨證並享受黨員所有一切權利的份子。現在，我們的人之弱點，並不是技術知識落後，而是政治上

的漠不關心態度，而是對於偶然混得黨證的人們的輕信態度，而是缺乏那種正確的審查工作人員的工作，即缺乏那種不按其政治宣言，而按其工作結果而加以審查的工作。現在我們所應解決的中心問題並不是消滅我們幹部之技術知識落後的現象，因為這種落後現象，大體上已經消滅了；而是消滅政治上的漠不關心態度和在政治上輕易信任那些偶然混得黨證的暗害份子的態度。

這就是我們培養幹部的事業在沙哈亭案件時期的中心問題與在目前時期的中心問題之間的根本差別。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在十年以前，我們不能而且不應一同提出兩個口號：精通技術的口號和給幹部以政治教育的口號。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現在對於舊的關於精通技術的口號，必須補充以新的關於精通布爾塞維主義，關於給幹部以政治教育和消滅我們的政治上漠不關心態度的口號。

(7) 必須打破和拋棄一種腐敗的理論，依照這種理論說來，似乎隨着我們每次的進展，我國的階級鬭爭，就會日益和緩起來；隨着我們的勝利，階級敵人，就會日益馴服起來。

這不僅是一種腐敗的理論，而且也是一種危險的理論，因為牠麻醉我們的人，把他們引入陷穽，給階級敵人以重整旗鼓來進行反蘇維埃政權鬭爭的可能。

相反的，我們今後的進展愈大，成績愈多，則已被擊破的剝削階級之殘餘，對我們的仇恨亦更甚，他們將更加決意採用更激烈的鬭爭方式，更其加緊損害蘇維埃國家，他們將更利用最冒險拚命的鬭爭手段，以作最後的掙扎。

應當注意到，在蘇聯已被擊破的階級之殘餘，不是孤立無援的，他們從蘇聯境外的敵人方面，得到直接的援助。如果以為階級鬥爭的範圍，只限於蘇聯境內，那是錯誤的。蘇聯境內之階級鬥爭戰線，是同時連接到包圍我們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關於這一點，已被擊破的階級之殘餘，是不能不知道的。正因為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今後也將繼續其冒險拚命的襲擊。

歷史正是這樣教訓我們。列寧主義正是這樣教訓我們。

必須記着這一切，並時刻警戒着。

(8) 必須擊破和拋棄另一種腐敗的理論，依照這種理論說來，凡不時時實行暗害，而有時尙在工作中表示一些成績者，就不會是暗害份子。

這種奇怪理論本身，就揭露出這理論發明者是如何幼稚。凡是暗害份子，如果不想在最短時期內就被揭破，便不會時刻都實行暗害；恰巧相反，真正的暗害份子，正應當有時也貢獻一些工作成績，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保持其暗害份子的地位，才能騙得人家的信任，才能繼續其暗害的勾當。

據我看來，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用不到再加解說。

(9) 必須打破和拋棄第三種腐敗的理論，依照這種理論說來，經濟計劃之經常完成，就能使暗害行為及其惡果，化爲烏有。

這類的理論，只能有一個目的，即鼓勵我們工作人員那種狹隘的各自誇耀自己的機關的態度，安慰他們，削弱他們反暗害勾當的鬥爭。

所謂「我們經濟計劃之經常完成，」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第一，事實已經證明，我們的一切經濟計劃，都是定得太低的。因為這種計劃沒有顧及蘊藏在我們國民經濟內部的莫大資源與可能。

第二，各個人民委員部之籠統完成經濟計劃，這還不是說某幾個很重要的部門，也同樣完成了計劃。恰巧相反，事實告訴我們，有許多人民委員部雖然是完成了，甚至超過了每年度的經濟計劃；可是，國民經濟中有幾個很重要的部門，卻經常沒有完成計劃。

第三，毫無疑義的，如果暗害份子沒有被揭破，沒有被驅除，那末，經濟計劃之實現程度，就會壞得多；關於這一點，發明這一理論的近視人物，是應當記着的。

第四，暗害份子通常是把主要的暗害勾當，不在和平時期實現，而是預備到戰爭前夜或戰

爭時期去實現！就假定我們拿『經濟計劃之經常完成』這種腐敗理論來安慰自己，而不去觸犯暗害份子吧。發明這種腐敗理論的人，知道不知道，如果讓暗害份子仍舊留在我們的國民經濟部門內，以『經濟計劃之經常完成』這種腐敗理論爲其護身符，那在戰爭發生時，他們就會給我們的國家，以何等巨大的損害。

所謂『經濟計劃之經常完成』的理論，乃是一種有利於暗害份子的理論，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嗎？

(10) 必須打破和拋棄第四種腐敗的理論，依照這種理論說來，斯塔漢諾夫運動，乃是足以消滅暗害勾當之主要的手段。

這種理論之所以設想出來，是要以關於斯塔漢諾夫者及斯塔漢諾夫運動的響亮空談，來撇開對暗害份子的打擊。

莫洛托夫同志在其報告中，舉出許多事實，證明庫茲巴斯和頓巴斯方面之托洛茨基暗害

份子及非托洛茨基暗害份子，如何利用我們某些在政治上漠不關心的同志之信任，經常欺騙了斯塔漢諾夫者，妨礙他們的工作，故意造成種種障礙，使他們不能有成效地工作，以至於搗亂了他們的工作。如果基本建設工程是以暗害辦法進行——例如在頓巴斯——而結果使採煤工作落後，不能與其他各種採煤工作相配合，那末，光靠斯塔漢諾夫者，會有什麼辦法呢？其實，斯塔漢諾夫運動本身，爲要推動事業前進而完成其偉大的使命，就需要我們進行鬥爭以反對暗害份子之一切陰謀詭計，而給該運動以切實幫助——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嗎？與暗害勾當作鬥爭，爲消滅暗害勾當而鬥爭，制止暗害勾當，是使斯塔漢諾夫運動能盡量廣泛開展的必要條件，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嗎？

我想，這一個問題，也同樣是很清楚的，用不着再加解說。

(11) 必須打破和拋棄第五種腐敗的理論，依照這種理論說來，以爲托洛茨基暗害份子，再沒有什麼後備力量了；以爲他們現在已在用盡其最後的一些幹部了。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只有思想幼稚的人，才能想出這種理論來。托洛茨基暗害份子，是有其後備力量的。這首先就是在蘇聯已被擊破的剝削階級之殘餘，其次就是國外許多仇視蘇聯的集團和組織。

譬如，就拿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的第四國際來說吧，這個國際，三分之二是由偵探和軍事破壞工作者組織而成的。這怎麼不是後備力量呢？這一偵探國際將推派幹部，來從事托洛茨基匪徒的暗探和軍事破壞工作，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嗎？

或者，再拿挪威騙子舍佛洛這一班人為例吧，這一班人曾給偵探頭領托洛茨基以藏身之地，並幫助他來陷害蘇聯。這一班人怎麼不是後備力量呢？這一反革命集團，今後也將為托洛茨基偵探和暗害者效勞——這誰能否認呢？

或者，再拿與騙子舍佛洛不相上下的，法國騙子蘇瓦林這一班人來說吧。這怎麼不是後備力量呢？這一夥騙子，同樣也將幫助托洛茨基匪徒，進行偵探和暗害勾當，反對蘇聯——這誰能

否認呢？

而德國的那些老爺們，如魯特、斐舍爾之流，馬斯洛夫之流，烏爾班斯之流，這班已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賣給法西斯蒂的敗類，怎麼不是進行托洛茨基偵探和暗害勾當的後備力量呢？

或者，再拿美國的以著名騙子依斯特曼爲首的一夥作家說吧。所有這些筆墨匪徒之唯一職業，就是污蔑蘇聯的工人階級。這班敗類，怎麼不是托洛茨基主義之後備力量呢？

總之，說托洛茨基匪徒已在用盡其最後一些幹部——這種腐敗理論，應該加以拋棄。

(12) 最後，還必須打破和拋棄一種腐敗的理論，依照這種理論說來，既然我們布爾塞維克很多，暗害份子很少，既然擁護我們布爾塞維克的有千百萬羣衆，而擁護托洛茨基暗害份子的，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幾十個人；那末，我們布爾塞維克就可以根本不去注意這寥寥無幾的暗害份子。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種異常奇怪的理論之所以設想出來，是爲的要安慰我們某些因爲

不會與暗害勾當作鬭爭，而在工作上遭受了失敗的領導同志，是爲的麻醉他們的警惕性，讓他們高枕而臥。

說擁護托洛茨基暗害份子的人，屈指可數，而擁護布爾塞維克的人，卻有千百萬，這當然是對的，可是決不能因此就說，暗害份子不能給我們的事業以極嚴重的損害。爲要實行搗亂，實行暗害，並不需要大批的人。爲要建築德聶普羅工程，是需要成千成萬的工人，但要炸毀這一工程，也許至多只需要十幾個人。爲要打勝仗，是需要幾軍的紅軍。但爲要在前線上破壞這一勝利，卻只要在某個軍部，甚至於只要在某個師部內有幾個能偷出作戰計劃而交與敵軍的偵探就夠了。爲要建築大的鐵路橋，需要數千人，但要炸毀這橋樑，卻只需要幾個人就夠了。像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

因此，不能以我們人數很多，而托洛茨基暗害份子人數很少這一點，來安慰自己。必需作到，使我們的隊伍當中，根本沒有托洛茨基暗害份子插足其間。

關於如何消滅在我們一切組織——經濟的、蘇維埃的、行政的以及黨的組織——之工作中所有共同缺點的問題，就是如此。

消滅這些缺點的必要辦法，就是如此。

至於專門關於黨組織及其工作缺點問題，則消滅這些缺點的辦法，在交給你們討論的決議草案中，已說得很詳細了。因此，我以為關於這一方面的事情，實無贅述之必要。

我僅想關於政治上訓練和深造我黨幹部的問題，說幾句話。

我以為，如果我們能夠，如果我們善於把我黨幹部自下至上，在思想上加以訓練，政治上加以鍛鍊，使其能夠很容易認清我國內外的環境，如果我們善於把他們造就為成熟的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解決國家領導上諸問題，而在解決中不犯嚴重錯誤，那麼，我們就把我們的一切任務，解決十分之九了。

我黨領導人材的情形，究竟怎樣呢？

如就領導人員說，我們黨內有三四千個上級領導者，這可說是我黨之將領。其次，便是三四萬個中級領導人；這可說是我黨之軍官。

再其次，便是十萬到十五萬個下級領導人員，這可說是於黨之士目。

提高這些指揮幹部之思想水平和政治鍛鍊，用那些期待提拔的生力軍，充實這些幹部，並這樣來擴大領導幹部——這便是當前的任務。

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什麼呢？

首先，就必須要我黨領導者，從支部書記起，一直到省委書記及共和國黨委書記，在相當期內，各自挑選出這樣兩個黨務工作人員，這兩個人都要是能够真正代替他們的人。有人會說：每個書記都要有兩個代替人，到那裏去找呢？我們沒有這樣的人，沒有相當的工作人員。同志們，這種說法是不對的。能幹的人，有天才的人，我們有千千萬萬。只不過要知道他們，要及時提拔他們，使他們不致消磨在原有的工作中而開始腐化就是了。去找吧，會找到的！

再者，爲要使支部書記得到黨的訓練和深造，必需在各省委之下，設立以四月爲期的『黨務訓練班。』必需派一切初級黨組織（支部）書記去受訓練。而在他們訓練期滿，回到原地工作後，就派他們的代替人及初級黨委內最有能幹的委員前往。

再次，爲要使區委第一書記受到政治上的深造，就必須在蘇聯各地，譬如說在十個最重要的地方，設立以八月爲期的『列寧主義訓練班。』必須派區委和州委第一書記受訓練，而在他們訓練期滿，回到原地工作後，就派他們的代替人及區委州委內最有能幹的委員前往。

再次，爲要使市委書記受到思想上政治上的深造，就必須在聯共（布）中央之下，設立以六月爲期的『黨史及黨政策研究班，』必須派市委第一書記或第二書記去受訓練。而在他們訓練期滿，回到原地工作後，就派市委內最有能幹的委員前往。

最後，必須在聯共（布）中央之下，設立以六月爲期的『國內和國際政治問題研究會。』必須派省委、邊委書記及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前往參加，這些同志，應從自己中間，造

就出不僅一批，而且好幾批能够替代我黨中央諸領導者的人材。這一點是必要的，這一點是應當做到的。

同志們，我的話快完了。

如此，我們已將我們工作中的主要缺點，我們一切組織——經濟的、行政的、黨的組織共同的缺點，以及我們黨組織所特有的缺點，都一一說出了；而工人階級之敵人，正是利用這些缺點來進行其破壞、暗害、偵探和暗殺的勾當。

其次，我們指出了必要的基本辦法，以便消滅這些缺點並使外國偵探機關之托洛茨基法西斯奸細所幹的軍事破壞、暗害、偵探及暗殺勾當，無法爲害。

試問，我們能否實現這一切辦法？是否有爲實現這一切所必要的可能呢？

我們是絕對能夠實現這一切辦法的。我們之所以能夠，是因爲我們擁有爲實現這些辦法所必要的一切工具。

我們所缺少的，到底是什麼呢？

所缺少的，只有一點：這就是剷除自己的漠不關心態度，自己的馬虎態度，自己的政治近視之決心。

難關就在這裏。

但是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基本上建設成功了社會主義，並且舉起了偉大的世界共產主義旗幟的我們，難道不能剷除這種荒謬而可笑的弊病嗎？

我們絕對能夠剷除這種弊病，這是沒有懷疑餘地的，當然，要是我們願意這樣做的話。而且我們並不是隨隨便便，而是以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來實實在在剷除這種弊病。

當我們剷除了這種荒謬的弊病時，我們便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說，我們不怕任何內奸外敵，我們不怕他們的襲擊，因為我們今後也將與過去和現在一樣，粉碎他們。

結 論

我在自己的報告裏，已經把我們現在所討論的事情之各個基本問題說過了。討論之結果，已經表明，我們的同志，對於這些基本問題，已有完全明白的認識，已經了解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並有消滅我們工作中諸缺點之決心。可是，討論之結果，同時也表明，同志們對於我們組織和政治的實際工作之某些具體問題，還沒有完全明確的認識。這樣的問題，據我看來，共有七個。

關於這些問題，請你們讓我說幾句話。

(一) 現在大概是大家都已了解，都已認識，過份醉心於經濟工作和經濟工作成績，而同

時却輕視和忘記黨的政治問題，——這樣的態度，勢必陷入絕境。因此，必須使我們工作人員轉而注意黨的政治問題，以便使經濟工作成績與黨的政治工作成績配合起來，同時並進。

那末，怎樣來在實際上實行加強黨的政治工作的任務，實行使我們的黨組織不必從事於經濟方面的一切瑣細事情的任務呢？從討論中可以看到，有些同志，想從這裏得出一個不正確的結論，以為現在應完全離開經濟工作。至少曾經有這樣的意見：好拉，謝謝地，我們現在已經不必從事於經濟事務了；現在我們已經可以來專門從事於黨的政治工作了。這個結論是否正確呢？是不正確的。以前我們的黨員同志，因醉心於經濟的成績，竟然離開了政治，——這是走極端，結果使我們受了大的損失。如果現在我們某些同志，因着手加強黨的政治工作，竟而想離開經濟工作，那末，這便是走另一個極端，結果會使我們受到同樣大的損失。決不可東搖西擺，從這個極端跑到那個極端。決不可把政治和經濟分開。我們決不能離開經濟，也好似我們不能離開政治一樣。為便於研究起見，人們通常在方法上把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分開。可是這祇是在研

究方法上分開，勉強分開，祇是便於研究起見。反之，在實際生活中，在實際工作中，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牠們兩者，同時並存，相輔爲用。因此，誰如果想在我們的實際政策中，把經濟和政治分開，以減弱政治工作爲代價來加強經濟工作；或反之，想以減弱經濟工作爲代價來加強政治工作，那他就一定要碰壁。

在決議草案中，專門有一條說到必須使黨組織不必從事於經濟方面的瑣細事務，而應加強黨的政治工作——這一條之意思，並不是說要離開經濟工作和經濟領導，而祇是說，不可再容許用我們的黨組織來代替經濟機關，其中也包含而且特別是農業管理機關，不可再容許這樣來破壞所有這些經濟機關之專責。因此，就必須融會貫通對於經濟機關的布爾塞維克領導方法，這方法之內容，就是經常地幫助這些機關；經常地加強這些機關；不是超過，而是經過這些機關來領導經濟工作。必須給經濟機關，尤其是農業管理機關，以優秀的人材；必須挑選新的優秀的、勝任的工作人員，來加強這些機關。祇有做完這些工作以後，才可指望黨組織將可完全不

必從事於經濟方面的瑣細事務。當然，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須要有相當的時間才能辦到。可是當這件事情還沒有辦到時，我們的黨組織，即在今後，在一定的短時期內，還得直接從事於農業事務及其一切瑣細事情，如耕種收割以及其他等等。

(二)現在，我關於暗害者、軍事破壞工作者、偵探等等，要說兩句話。我想，現在大家都已明白，現時的暗害者和軍事破壞工作者，不管他們所掛的幌子如何——無論是托洛茨基的幌子或布哈林的幌子都是一樣，——早已不是工人運動中間的政派，他們已變成毫無原則的、毫無思想的、以進行暗害、軍事破壞、偵探、殺人行兇為職業的匪股。很明顯的，這些老爺們，既是工人階級底仇敵，既是賣國賊，當然應被我們無情粉碎和連根剷除。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用不着詳加解釋。

可是，在這裏就發生一個問題：究竟應如何具體實現這一粉碎和連根剷除日德奸細托洛茨基份子之任務呢？這是不是說，我們所必須粉碎和連根剷除的，不僅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份子，

而且連那些曾有一個時候動搖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但後來早已離開托洛茨基主義的人，也包含在內呢？這是不是說，我們所必須打擊和連根剷除的，不僅是那些真正是進行暗害勾當的托洛茨基奸細份子，而且連那些曾於某一個時候偶然走過某一個托洛茨基份子曾於某一個時候走過的街道的人，也包含在內呢？至少在這次全會上，是有過這樣的意見。是否可以認為，這種對於全會決議的了解是正確的呢？是不能認為正確的。在這個問題上，也好似在其他所有一切問題上一樣，必須對於每一個人都有各別對待，分別對待的態度。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混為一談。這種籠統的對待，只能妨害我們與真正的托洛茨基暗害份子及偵探作鬭爭的事業。

在我們的負責同志中，有一些過去的托洛茨基份子，這些份子，早已離開托洛茨基主義，而且他們之進行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鬭爭，不僅不亞於，而且勝於我們某些很可敬重的，未曾動搖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過的同志。如果現在來侮辱這樣的同志，那便是愚蠢了。

在我們的同志裏面，也有這樣一種同志，這些同志，在思想方面，向來都反對托洛茨基主義，

可是雖然如此，他們却和個別的托洛茨基份子有過私人的關係，當他們一明白托洛茨基主義之實際面貌時，他們就立刻斷絕了這種關係。他們沒有及時斷絕他們自己與個別托洛茨基份子之私人朋友關係，而遲緩了些，這當然是不好。可是，如果把這些同志拿來與托洛茨基份子混爲一談，那便是愚蠢了。

（三）正確挑選工作人員，正確分配他們工作——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在挑選工作人員時，第一，是應根據政治的標準，就是說——看他們是否配受政治上的信任；第二，是要根據實事求是的標準，就是說，看他們是否能做某一種具體工作。

這就是說，不要把實事求是的態度變爲事務主義的態度，這就是說，不可只注意工作人員之實際工作能力，而不注意他們的政治面貌。

這就是說，不要把政治的標準，變成唯一而詳盡無遺的標準，這就是說，不可只注意工作人員之政治面貌，而不注意他們的實際工作能力。

是否可以說，我們的黨員同志，是遵行着這個布爾塞維主義的規則呢？可惜不可這樣說。在這次全會上，同志們已經說到這一點，可是還沒有完全說出。問題就在於這個久經考驗的規則，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往往被人違背到極點。人們在挑選工作人員時，多半不是根據客觀的標準，而是根據偶然的、主觀的、庸俗而鄙陋的標準。人們所挑選的工作人員，多半都是他們的所謂老相識、朋友、同鄉、對他們個人忠實的人物，善於捧自己的上司的老手——而絲毫也不管他們在政治方面和工作能力方面是否勝任。

很明顯的，這樣挑選出來的一批人，並不是一個領導工作的負責人員集體，而是由親戚朋友所團聚而成的家庭，夥友會，其中的夥友大家都想和平共居，你不得罪我，我不得罪你，不肯家醜外揚，卻彼此吹噓，互相捧場，並時常向中央遞呈空洞而令人噴飯的報捷書。

不難明白，在這樣家庭式的環境裏，當然既不會有批評工作缺點的餘地，也不會有工作領導者實行自我批評的餘地。

很明顯的，這樣一種家庭式的環境，自然使拍馬屁的人，喪盡人格觀念，因而與布爾塞維主義毫不相干的人，容易滋長起來。

試拿米爾作揚與瓦依諾夫兩同志做例吧。前者是卡查赫斯坦的邊委書記，後者是雅羅斯拉夫省的省委書記。這兩個人在我們當中並不是最壞的工作人員。可是他們是怎樣挑選工作人員的呢？前者從自己以前做過工作的地點——阿捷爾拜疆和烏拉爾——一共隨身帶了三四十個『自家人』到卡查赫斯坦，並把他們在卡察赫斯坦方面安插了負責的職位。後者——也是從他過去做過工作的地方——頓巴斯——隨身帶了十多個『自家的』人到雅羅斯拉夫省去，也是給他們安插了很負責的職位。由此可見，米爾作揚同志是有自己的夥友會的。瓦依諾夫同志也有自己的夥友會。難道他們沒有可能根據人所共知的布爾塞維主義挑選和佈置人材的規則來從當地的人材中挑選工作人員嗎？當然是有可能的。爲什麼他們沒有這樣幹呢？因爲他們違背了布爾塞維主義挑選工作人員的規則，而這個規則是絕對不容許以庸俗而鄙

陋的態度，絕對不容許按親戚朋友的私人感情的標準去挑選工作人員的。除此而外，這些同志，如此挑選對他們個人忠實的人擔任負責工作，他們大概是想給自己造成多少獨立的環境，既不依賴於當地的人，也不依賴於黨的中央。假定說，米爾作揚和瓦依諾夫兩同志因為某種情況，而將由他們現在工作的地點被調到別的地方去，那時候，他們將如何處置他們的『隨員』呢？難道他們又得把自己的『隨員』帶到新的工作地點去嗎？

你們看，違反布爾塞維主義關於正確挑選和佈置工作人員的規則的行動，是可以弄到如何荒謬絕倫的地步。

（四）審查工作人員，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這是什麼意思呢？
審查工作人員，這就是說，不是以工作人員之允諾和宣言為標準，而是以他們的工作結果為標準來加以審查。

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這就是說，不僅是在辦公室裏，不僅是按他們的形式上的工作

報告來審查，而首先是要在工作地方，按實際的執行結果來審查。

一般說來，是否需要這樣的審查呢？是絕對需要的。其所以需要，第一，就是因為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透澈無遺地認識工作人員，查明他的真正品質。其所以需要，第二，就是因為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該工作指示本身之優點和缺點。其所以需要，第三，就是因為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執行機關之優點和缺點。其所以需要，第三，就是因為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該工作指示本身之優點和缺點。

有些同志認為，對於工作人員的審查，只可以從上而下來實行，就是領導者根據被領導者之工作結果來審查被領導者。這種想法是不對的。從上而下來審查，當然是需要的，因為這是審查工作人員及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的有效辦法之一。可是，從上而下的審查，還遠不能概括整個審查工作。除此而外，還有另外一種審查方法，即從下而上的審查，就是說，由羣衆，由被領導者來審查領導者，指出他們的錯誤，並指明改正這些錯誤之辦法。這種審查，乃是最有效的審查工作人員的辦法之一。

黨員羣衆，在積極份子會上，在代表會議上，在代表大會上，審查自己的領導者，其方法就是聽他們的工作報告，批評他們的缺點，選舉或不選舉這個或那個領導同志爲領導機關的人員。我們黨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之在黨內確切執行；黨機關之毫無條件地以選舉手續產生；提出候選人以及取消候選人資格之權利；不公開的投票法；批評和自我批評之自由，——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辦法必須確切實行，以便同時也使黨員羣衆易於審查和監督黨領導者。非黨員的羣衆，在非黨員的積極份子會上，在各種各樣的羣衆會議上，審查自己的經濟工作的、職工會的以及其他的領導者，這些羣衆，在這些會議上聽自己的這些領導者之工作報告，批評缺點，並指出改正這些缺點之辦法。

最後，全國人民，在選舉蘇聯之政權機關的時候，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公開的選舉辦法，來審查自己的國家領導者。

任務就在於把從上而下的審查和從下而上的審查聯接起來。

(五) 根據幹部本身的錯誤來訓練幹部——這是什麼意思呢？

列寧曾教訓我們，誠懇地揭露黨的錯誤，研究產生這錯誤之原因，指出為改正這些錯誤所必要的辦法，乃是正確訓練和教育黨的幹部、正確訓練和教育工人階級及勞動羣衆之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列寧說：

『一個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標準之一，以審查這個政黨是否鄭重其事和是否是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羣衆之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這錯誤之原因，分析產生這錯誤之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錯誤之方法——這便是鄭重其事的政黨之標誌，這就是政黨履行自己的義務，這就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

這就是說，布爾塞維克之義務，不是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是躲避關於自己的錯誤之問題，好似我們這裏所常見的一樣，而是誠懇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誠懇而公開指出改正這些錯誤之

辦法，誠懇而公開改正自己的錯誤。

我不能說，我們的很多同志都是樂意這樣做。可是，布爾塞維克，如果真是願意自己不愧爲布爾塞維克，就應當有勇氣來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揭露產生錯誤之原因，指出改正錯誤之辦法，並這樣來幫助黨給自己的幹部以正確的訓練和正確的政治教育。因爲只有在這條道路上，只有在公開而誠懇的自我批評的環境中，才可以造就真正的布爾塞維克幹部，才可以造就真正的布爾塞維克領袖。

且舉兩個例子，來證明列寧這個原理之正確。

例如，拿我們以前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錯誤來說。你們大概記得，在一九三〇年，當時我們的黨員同志，竟想在什麼三四個月內，就把引導農民轉入集體農莊建設道路的這一個極複雜的問題，完全解決；當時，我們黨的中央，曾不得不約束這些陷入迷途的同志。這會是我黨生活裏最危險的時期之一。當時的錯誤就在於我們黨員同志竟忘記了集體農莊建設之自願原則；

竟忘記了絕不可用行政的強制手段使農民轉入集體農莊的道路；竟忘記了集體農莊建設所要求的，不是幾個月的工夫，而是幾年的、仔細和考慮週到的工作。他們忘記了這一點，而且曾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你們大概記得，當時，中央曾指出這種因有勝利而頭腦發昏的毛病，並警告地方的同志，叫他們不要忽略實在環境而跑得太前；——中央這種指示，曾遇到很大的反抗。可是，雖然有這種反抗，而中央却始終以中流砥柱的精神反對這種潮流，並把我們的黨員同志引入正軌。結果怎樣呢？現在誰也看得清楚，我們黨終於如願以償，而把我們的黨員同志引入正軌。現時，我們有好幾萬個從農民中間培養出來的、從事於集體農莊建設和集體農莊領導的出色的幹部。這些幹部，乃是根據一九三〇年的錯誤而訓練和教育出來的。可是，如果當時我們黨沒有覺悟到自己的錯誤和沒有及時加以改正，那我們現在就不會有這樣的幹部。

另外一個例子，便是工業建設方面的例子。我所指的就是我們在沙哈亭暗害事件時期的錯誤。我們當時的錯誤，就在於我們沒有注意到我們工業幹部之技術落後的全部危險，我們當

時容忍了這種落後現象，曾想藉助於敵視我們的專門家來開展廣闊的社會主義工業建設事業，這樣，就使我們的經濟幹部只能做一種不好的、坐在資產階級專門家旁邊的監督人。你們大概記得，當時我們的經濟幹部，曾如何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曾如何不願意承認自己的技術落後，曾如何難得領會『精通技術』的口號。結果怎樣呢？事實證明，『精通技術』的口號，是發生了效力，並給予了良物的結果。現在，我們已經有幾萬和幾十萬個很出色的布爾塞維克的經濟幹部，他們已精通了技術，並推動着我們的工業前進。可是，如果我們黨在當時是遷就了那些不願承認自己技術知識落後的經濟工作人員之頑強態度，如果我們黨在當時沒有認識自己的錯誤，沒有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那末在現時，就不會有這樣的幹部。

有些同志說：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是不適當的，因為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就會被我們的敵人看作我們是軟弱無力，會被我們的敵人所利用。同志們，這是無關緊要的，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恰巧相反，我們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並誠懇改正這些錯誤，適足以加強我們黨，提高我們

黨在工人、農民以及勞動智識份子中間的威信，加強我們之力量與威勢。而這正是主要的。只要是工人、農民、勞動智識份子與我們一塊，那末其餘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另外有些同志說：若是我們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那結果，並不能教育和鞏固我們的幹部，而是使其削弱，使其解體；他們說：我們應當憐惜和愛惜我們的幹部，我們應當憐惜他們的面子和愛護他們的安定。因此，他們主張掩飾我們的同志之錯誤，減弱批評力量，而最好根本不過問這些錯誤，這種立場，不僅是根本不正確，而且極端危險，而尤其是對於他們所想『憐惜』和『愛護』的那些幹部有危險。用掩飾幹部所犯錯誤之方法來憐惜和保護幹部，這就一定會戕害這些幹部。如果我們在一九三〇年沒有揭露我們當時所犯的錯誤，並根據這些錯誤來訓練我們自己的布爾塞維克的集體農業幹部，那我們就一定會把這些幹部戕害了。如果我們在沙哈亭暗害事件時期沒有揭露我們的同志當時所犯的錯誤和沒有根據這些錯誤來訓練我們自己的布爾塞維克的工業幹部，那就一定會把這些工業幹部戕害了。誰要想用掩飾我們的幹部

所犯錯誤的方法，來憐惜他們的面子，那他就會既戕害幹部，又戕害幹部之面子，因為他既掩飾他們的錯誤，就使他們容易重復犯出新的，也許更嚴重的錯誤，這些新錯誤，一定會把這些幹部弄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結果，使他們的『面子』與『安定』都化爲烏有。

（六）列寧曾教訓我們，不僅要教導羣衆，而且要向羣衆學習。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我們領導者，不應當驕傲，而應當了解，我們雖然是中央委員或人民委員，但這還不是說，我們已具有爲實行正確領導所必要的一切智識。職位本身並不能給予智識和經驗。稱號就更不必說了。

這就是說，只靠我們自己的經驗，只靠領導者之經驗，還不足以實行正確的領導；因此，除自己的經驗，除領導者之經驗以外，還須用羣衆之經驗，用黨員羣衆之經驗，用工人階級之經驗，用全國人民之經驗，以補不足。

這就是說，一刻也不可減弱我們與羣衆的聯繫，更不必說隔斷我們與羣衆的聯繫了。

最後這就是說，必須仔細傾聽羣衆之意見，必須仔細傾聽平常黨員之意見，必須仔細傾聽所謂『無關重要的人』之意見，必須仔細傾聽全國人民之意見。

什麼叫做正確的領導呢？

這絕對不是說坐在辦公室裏發號施令。

正確領導——這就是說：

第一，必須正確決定問題，而爲要正確決定問題，則非估計到羣衆所有的經驗不可；羣衆是親身經受到我們的領導之結果的；

第二，必須組織正確決定之執行，而爲要組織這種執行，也是非有羣衆之直接幫助不可。

第三，必須組織對於執行這種決定之情形之審查，而爲要組織這個審查，也是非有羣衆之直接幫助不可。

我們領導者，只是從一方面，可以說，只是從上面看見事物、事變、人；可見我們的眼界，是有多少限制的。反之，羣衆却是從另一方面，可以說，是從下面看見事物、事變、人；所以他們的眼界，也是有相當的限制。爲要得到問題之正確解決，就必須把這兩方面的經驗綜合起來。只有這樣，領導才能是正確的。

不僅要教導羣衆，而且要向羣衆學習——其意義就是如此。

且舉二個例子，來證明列寧這個原理的正確。

第一個例子。幾年以前，我們，中央委員，討論了關於改善頓巴斯工作的問題。重工業人民委員部當時所提出來的辦法草案，顯然不能令人滿意。我們曾接連三次把草案交回重工業人民委員部。我們曾接連三次從重工業人民委員部得到各種各樣的草案。可是所有這些草案，沒有一個可以認爲令人滿意的。結果，我們就決定從頓巴斯召來幾個工人和普通的經濟工作人員和職工會工作人員。我們與這些同志一共談了三天話。結果，我們大家，中央委員，不得不承認，只

有他們這些普通的工作人員，這些所謂「無關重要的人」才終能指教我們做出正確的決定。你們大概記得中央和人民委員會之有名的關於加強頓巴斯採煤工作辦法的決定。而中央和人民委員會這個決定——這個決定，已被我們一切同志所公認為正確，甚至於公認為著名的決定——正是由下層的普通人指教我們規定的。

另外一個例子。我所指的就是與尼可拉安科這位女同志有關的例子。尼可拉安科是個什麼人呢？尼可拉安科乃是一位平常的黨員。她是一個很平常的「不關重要的人」。在整整一年當中，她屢次發出警號說基也輔黨組織內情形不好；她屢次揭露濫用私人的現象；她屢次揭露那種以庸俗鄙陋的態度對待工作人員的現象，壓制自我批評的現象，托洛茨基暗害份子盤據重要職位的事實。可是，人們却多方迴避了她，好像迴避討厭蒼蠅一樣。結果，人們為要完全把她驅退，竟開除了她的黨籍。無論是基也輔組織也好，無論是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也好，都沒有幫她把問題弄得水落石出。只是因為聯共（布）中央出來干涉的結果，才得把這個糾纏不

清的結子解開。調查結果查明了什麼呢？結果查明了尼可拉安科原來有理，而基也輔組織却原來無理。事實正是如此，毫釐不爽。試問尼可拉安科究竟是個什麼人呢？她當然不是中央委員，不是人民委員，不是基也輔省委書記，甚至於不是什麼支部書記，她不過是一位平常的普通的黨員而已。

你們由此可見，平常的人，有時候，原來比某些高級機關更接近於真理得多。

像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幾十個幾百個來。

由此可見，爲要領導我們的事業，光靠我們的經驗，光靠領導者之經驗，還是遠不夠的。爲要實行正確的領導，除有領導者之經驗而外，還須用黨員羣衆之經驗，工人階級之經驗，勞動者之經驗，所謂『無關重要的人』之經驗，以補不及。

在什麼情形下才能做到這一步呢？

一定要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才能做到這一步，就是說，一定要領導者是與羣衆有密切的聯

繫，一定要領導者是與黨員羣衆、與工人階級、與農民、與勞動智識份子有極密切的聯繫。

與羣衆發生聯繫，鞏固這種聯繫，隨時都決意傾聽羣衆之意見——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之力量所在及其必勝不敗之原因。

只要布爾塞維克保存着他們與廣大民衆的聯繫，那他於將一定是必勝不敗的——這可以說是一個定律。反之，布爾塞維克只要是一脫離羣衆，一喪失自己與羣衆的聯繫，一染上官僚主義的毛病，那他們就會喪失任何的力量，而變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臘人的神話中，曾有一個著名的英雄，他名叫安泰；據神話所說，他的父親是海神波賽東，他的母親是地神蓋婭。他非常敬愛他這位生育、撫養、教導了他的母親。這安泰很有力量，任何人都戰他不過；因此大家都叫他無敵英雄。他爲什麼這樣有力呢？原來是因爲每當他與敵人決鬪而遇到困難時，他總是在地上，就是說在生育和撫養了他的母親身上靠一靠，因而便取得新的力量。可是，他終究還有一個弱點，就是生怕離開地面。敵人因爲知道他這個弱點，所以

就時刻等待機會。有一次，他碰到了一個敵人，這敵人利用了他這個弱點，並打敗了他。這敵人名叫蓋爾枯里斯。可是這敵人是怎樣打敗他的呢？原來這敵人設法使他離開地面，把他騙入空中，使其無法與地面接觸，結果便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認爲，布爾塞維克也好似這個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一樣。正好似安泰一樣，布爾塞維克之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爲他們與他們那生育、撫養和教導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維持着聯繫。只要他們與自己的母親，與人民維持着這種聯繫，他們將仍有必勝不敗之一切可能。

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所以必勝不敗之關鍵。

(七)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我所指的就是關於我們的某些做黨工作的同志，對於個別黨員之命運所採取的那種形式主義的、官僚主義的漠視態度，對於開除黨員之黨籍或恢復黨員之黨籍問題所採取的那種形式主義的、官僚主義的漠視態度。這是因爲我們的某些做黨的領導工作者，犯有一個毛病，就是缺少對人、對黨員、對工作人員之關注。而且他們並不考察本組織

內的黨員，不知道他們如何生活，如何發展；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人員。因此，他們就缺乏以分別對待的標準去對待每個黨員，每個黨務工作人員的態度。而正是因為他們在估計黨員和黨務工作人員的時候，沒有遵守分別對待的標準，於是他們通常都是輕意從事：不是籠統而不權衡輕重地褒獎他們，便是籠統而不權衡輕重地糟蹋他們，成千成萬地把他們開除出黨。這樣的領導者，動不動就是以萬數為單位，而不屑于關注什麼『個別的單位』，而不屑於關注個別黨員，而不屑於關注個別黨員之命運。在他們看來，開除什麼幾千幾萬個黨員出黨，根本就算不得什麼，卻反而安慰自己道：我們黨的黨員人數既有兩百萬之多，那末開除幾萬個人出黨，是不能對黨發生任何影響的。可是，只有實際上極端反黨的人，才能如此對待黨員。

因為有以這種漠視態度來對待人、對待黨員、對待黨務工作人員的結果，所以在一份位黨員裏使用人工造成一些心懷不滿的情緒和憤憤不平的心理，而托洛茨基兩面位子，便乘機抓着這些憤憤不平的同志，並巧妙地把他們拖到托洛茨基暗害勾當的泥坑中去。

托洛茨基份子，就其本身說來，從來也未在我們黨內有過什麼大的勢力。請你們回憶回憶一九二七年在我們黨內所發生的最後一次辯論吧。這次辯論，曾是真正的全黨公決。當時在我們黨內共有八十五萬四千黨員，參加表決的，有七十三萬。其中表決贊成布爾塞維克的，就是說贊成我黨中央而反對托洛茨基份子的，共達七十二萬四千之多；而贊成托洛茨基份子的，卻不過四千，就是說，約近千分之五；表示懷疑的，有兩千六百。有十二萬三千黨員沒有參加表決。他們之所以未參加表決，或是因爲在旅程中，或是因爲在工作中。如果對於贊成托洛茨基份子的四千票，再加上所有表示懷疑的票數，——假定他們也是同情托洛茨基份子的；其次，如果除此而外，還加上那沒有參加表決的票數之一部份，——假定其中有一部份也是同情托洛茨基份子的，而且即令不按通例只取其中千分之五，而是取其中百分之五，即是說，約近六千黨員，那末結果所得，這樣或那樣同情托洛茨基主義的，總共也不過一萬二千黨員。你們看，這就是托洛茨基老爺們之全部力量。除此而外，如果你們還注意到一點，就是在這一萬二千人中間，很多人早已

對托洛茨基主義表示失望並離開了他，那你們就能明白知道托洛茨基份子的力量是如何渺小了。而如果雖然如此，托洛茨基暗害份子終究在我黨週圍找得一些後備力量，那末這是因為我們的某些同志，對於開除黨籍和恢復黨籍的問題，採取了不正確的政策，因為我們的某些同志，對於個別黨員和個別工作人員之命運採取了漠視態度，而正是因為他們採取這樣的不正確的政策和不正確的態度，於是他們就用人工造成了一些心懷不滿和憤憤不平的人，這樣給托洛茨基份子造成這些後備力量。

在開除黨員之黨籍時，大部分都是以所謂消極為藉口。什麼叫做消極呢？原來人們認為如果某一個黨員，沒有精通黨綱，那末，他就是消極份子，應被開除黨籍。可是，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決不可這樣咬文嚼字地了解我們的黨章。為要精通黨綱，非身為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久經考驗和富有理論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可。我可不知道，我們的黨員當中是否有很多人已經精通我們的黨綱，已成爲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富有理論修養和久經鍛鍊的馬克思主義

者。如果再繼續照這條道路走去，那末，我們就會只能把智識份子和學者留在黨內。誰需要這樣的黨呢？我們有受過審查的、備受一切考驗的、列寧的黨員定義。這個定義就是：凡承認黨員、繳納黨費、並在某一個黨組織內工作者，皆得為黨員。請你們注意，在列寧的定義裏所說到的，並不是精通黨綱，而是承認黨綱。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絲毫用不着證明，在這裏，有理的是列寧，而不是我們的黨務工作同志，而不是我們的那些妄談什麼精通黨綱的黨務工作同志。這本來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黨所持的出發點，是認為只有那些已經精通黨綱、已成爲富有理論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同志才得爲黨員，那末，我們黨就不會在自己黨內設立成千的黨課組，成百的黨校，讓黨員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幫助他們精通我們的黨綱。很明顯的，我們黨之所以在黨員中間組織這樣的黨校和黨課組，正是因爲我們黨知道，黨員們還沒有來得及精通黨綱，還沒有來得及成爲富有理論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

因此，爲要糾正我們對於黨員資格問題和開除黨籍問題的政策，就必需消除在有的那一

種荒謬絕倫的關於消極份子問題的見解。

可是，我們在這一方面還有另一種錯誤。問題在於我們的同志根本就不承認處在兩個極端之間的正軌。只要某一個工人同志，某一個黨員，稍微犯了一點過失，遲到了一兩次黨員會議，因某種原因沒有繳納黨費，人們就立刻把他逐出黨外。誰也不注意他所犯過失的程度，不到會的原因，未繳納黨費的原因。在這些問題上所表現的官僚主義，簡直是空前未有的。不難懂得，由於這種漠視政策的結果，許多很好的幹部工人，優秀的斯塔漢諾夫者，竟被拋出黨外。難道在開除黨員之黨籍以前，不可以給以預告；而如果預告無效，難道不可以給以勸告或警告；如果這仍然無效，難道不可以給以改正錯誤的期限；或者萬不得已時，難道不可以將其由正式黨員轉為候補黨員，而並不一下子就開除其黨籍嗎？當然，本來是可以這樣做的。可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用關心態度，對待每個人，對待每個黨員，對待每個黨員之命運。而這一點正是我們的某些同志所缺少的。

同志們！已經應當，而且早已應當消滅這種豈有此理的現象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1842B

500

編號	11410
/冊	定價

\$.15

原料工價等 茲行人及印

款項加一

請希予 見本